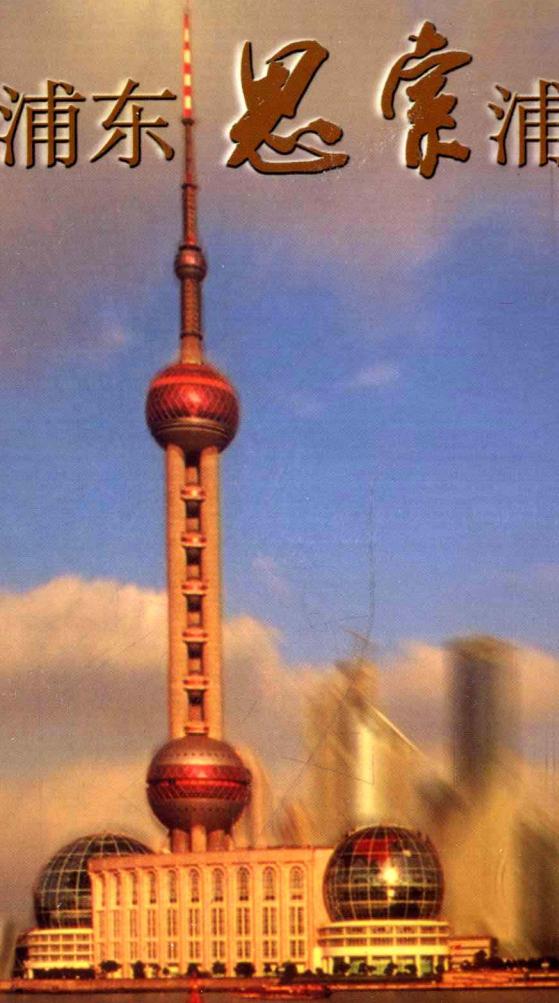


TOUSHI PUDONG SISUO PUDONG

浦东开发浦东

万曾炜 袁恩桢 等著

上海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浦东浦东

万曾炜 袁恩桢 等著

谨以此书向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献礼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透视浦东 思索浦东/万曾炜 袁恩桢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8-03848-1

I 透 II ①万 ②袁 III 区(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上海市 IV F127.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652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汤中仁

装帧设计 邹纪华

透视浦东 思索浦东

万曾炜 袁恩桢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9 字数 149,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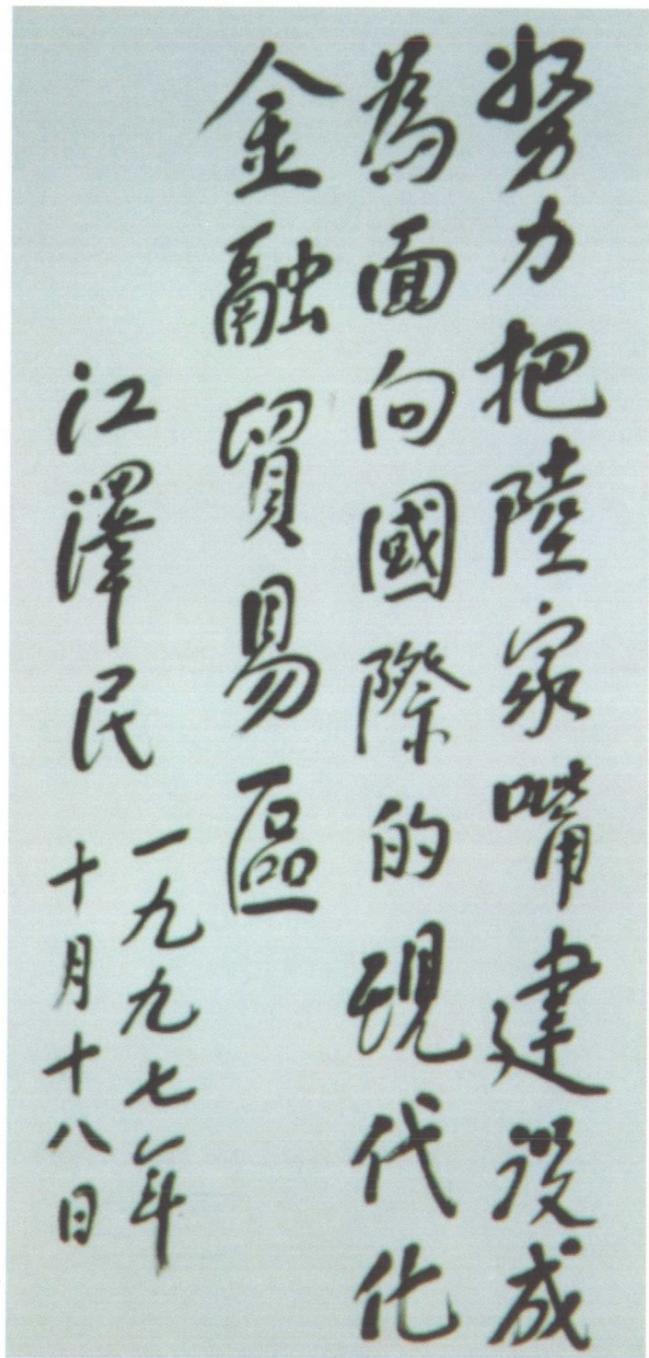
ISBN 7-208-03848-1/D·669

定价 20.00 元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浦东陆家嘴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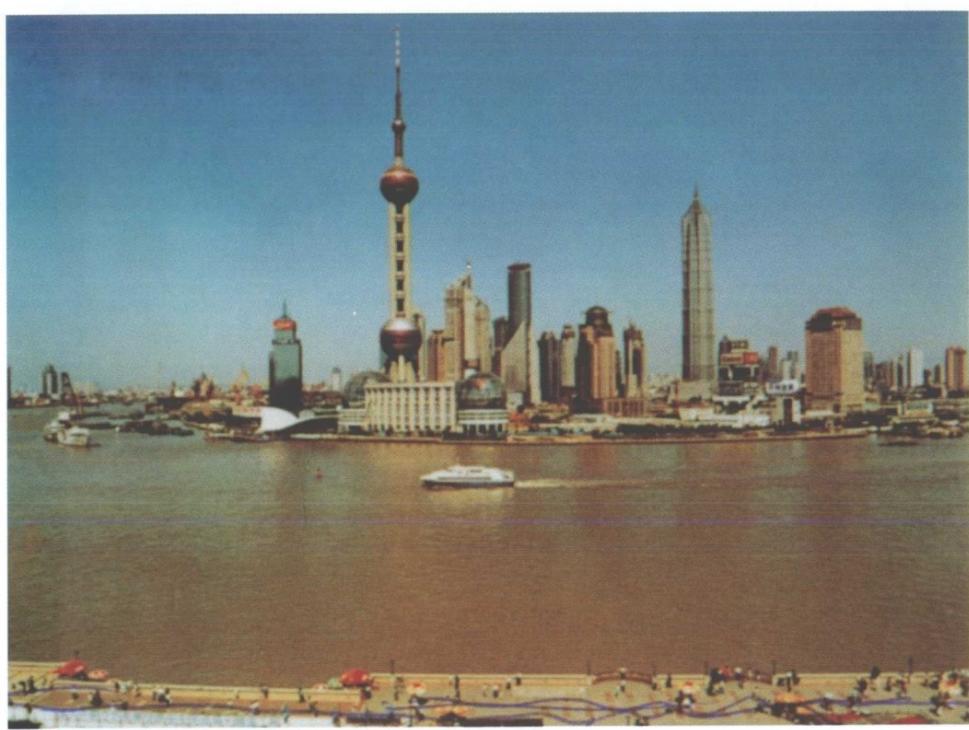
江泽民总书记题辞





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招待会

浦东：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小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浦东国际机场

设施先进的进才中学





普通民居——金桥湾

惊叹浦东巨变



主 编 万曾炜 袁恩桢
作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曾炜 许俭安 汤静波
武 伟 袁恩桢 韩汉君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

(代序)

赵启正

浦东开发，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慎重研究、决策，于1990年向世界宣布的一项中国的国家战略项目。当时的世界不知道浦东在哪里，也不清楚浦东开发的意义何在，更无法理解浦东开发与中国的国家战略有何关系。今天，虽然十年时间一跃而过，但世界已经对浦东不再陌生了，浦东开发所创造的天翻地覆的人间奇迹已不仅为当今世界，而且将在人类历史上开创出足够的知名度。然而，浦东开发的巨大成功对国家战略的实现起了什么作用，还尚未有更多的舆论或理论去评价或研究，我想这恐怕就是本书需要去探讨的一个主要课题。

一、浦东开发的国家战略意义

十年前国家提出浦东开发,是在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面临比较困难的阶段,再加上西方某些国家又全面向我国施压的关键时刻所着的一只棋。一棋落准,全盘皆活,此后便引导了内外形势的全面翻转。要解读其中的缘由,我们不能不联系到贯穿于上世纪很长历史时期的两种社会制度的敌对性较量历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冲突最激烈、变革最频繁、创新最踊跃、发展最迅速的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乃至伴随着的风风雨雨的发展、动摇、分化、革新,也是其中最为瞩目的事件之一。

自1917年诞生了苏维埃政权以及在资本主义包围圈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制度模式,严重冲击着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东欧、亚洲迅速发展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从20年代到50年代,这些国家充分显示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无比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出现了惊人的爆发力。而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却经历了多次长短不等的如瘟疫一般会迅速蔓延的经济危机。对比之下有不少专家学者惊呼:社会主义将迅速地、无可避免地替代资本主义。

6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大锅饭”弊端开始全面显露,

尤其是取消商品经济、抹杀价值规律作用的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推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更是抑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宏微观经济效益的严重低下。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却进行了体制改良，特别是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在这一时期广泛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自动化生产体系的全面形成，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带动了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轮番调整和升级，连后起的亚洲“四小龙”也躬逢其盛，出现了难以想像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景象。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技术物质力量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难以想像的神话。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日益高涨的政治经济压力，改革已不可避免地摆在这些国家面前。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多年未找到改变经济长期凋敝的改革钥匙而转向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从而全面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放弃和部分国家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产生、发展，尤其是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竞争后，却受到了几遭灭顶的冲击。然而，这些决然倒戈并在一夜之间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未由此迅速摆脱经济困境，反而是长时期地经受通货膨胀、商品短缺、企业关闭、职工失业等困扰，而民族纷争的历史老账却又在混乱的政治经济局面中沉渣再起，不断破坏稳定，引发战争，把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推到了水深火热的生活境地。

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道路，重点把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向前台，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制

度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进行相应的变革。而且，中国的改革不采取急进的、突变的办法，而是渐进的、逐步接近转换目标的模式。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树一帜的改革路子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绩效，经济高速增长，人民普遍受惠，国家地位上升，因而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旅居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华人的认同和拥护。

然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较劲、冲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改革却一直抱着微妙的心态和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它们既不希望也不相信中国的改革能成功、经济能迅速发展，但又不愿放弃与中国的接触交往和投资贸易，以期望在中国的改革成果中分得它们的一杯羹。由此造成了既交往又摩擦、既合作又冲突的矛盾格局，而浦东开发恰恰是这种冲突的产物。

1990年前后，正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自我完善异化为自我毁灭的质变阶段，资本主义阵营当然求之不得，给予这些国家以全面的支持和援助，这对中国的压力之大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国内又遭遇价格改革攻关及过热经济失控导致的高通货膨胀侵袭，国家不得不作出对宏观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决定。更为困难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所引发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反华措施。这就形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内稳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同时遇到严重困难的“四碰头”局面。浦东开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作出的慎重稳妥而又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

浦东开发的国家战略意义在于:

一是向世界宣布,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80年代作为重点改革开放的地区一般都在边境前线及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而浦东开发的提出意味着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的试点,这在当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反过来也表明了中央对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的决心和信心。浦东开发的宣布,使西方反华人士在“六四”风波以后所散布的“中国改革开放已不再继续”,并企图孤立、制裁我国的阴谋难以得逞。

二是加速市场化的体制转换,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有限体制目标,这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走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过渡。其措施是逐步放开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的产供销,让市场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去局部取代原由政府担当的角色,而在消费品的最终分配和消费方面,则完全由政府交给市场去运作。应该说,80年代的改革成效,体现在结束了长期困扰传统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的弊端,使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与提高,使整个经济有了快速的增长。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和改革还不彻底等原因,使当时的改革一波三折,道路并不坦直。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1)宏观经济容易过热并伴发急性通胀进而引发银行挤兑、市场抢购、商

品脱销、秩序混乱等现象；(2)生产资料的商品化改革还处在“双轨制”阶段，造成较长时期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等主要产品一物多价，价差甚大，带来生产、流通领域的严重秩序混乱以及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3)土地、房屋、资金、外汇、产权等要素领域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主导，以致这些方面的供给仍处瓶颈状况，与整体的改革趋势和经济发展要求严重地不相适应；(4)对外开放有了很好的起色，但也饱受了进口商品和物资的市场冲击，民族工业，特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传统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已受到冷落，生产、销售以至企业的生存都出现了问题，由此引起各方面对开放的思想认识也不一致。

可以说，当时的改革开放是处在十字路口，进一步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一是放慢速度求稳定，结合宏观经济环境的治理和经济秩序的整顿，推迟与放慢改革与开放的进程和力度；二是浪头弄潮，急流勇进，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题，继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当时，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基础上再跨越一步，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阶段。浦东开发，其实就扮演了在我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的区域试点角色，也由此拉开了我国 90 年代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序幕。

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得到成功的探索，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屈不挠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提供新鲜经验。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使得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预测两种制度必将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但眼下的事实却是，中国经济神奇般地崛起，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仍几无